

修正主义

馬克思主义思想史論丛

〔英〕利·拉貝茲編

(供內部參考)

修正主义

馬克思主义思想史論丛

〔英〕利·拉貝茲編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供内部参考)

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丛
〔英〕利·拉貝茲編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7 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统一书号: 3017·93

1963年9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5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 348 千字

印张 15 $4/16$ 印数 3,501—5,000 册

定价(9)1.90 元

出版說明

本书系美国紐約弗雷德里克·阿·普萊格出版社 1962 年出版(英国伦敦向德公司印刷),同时列为該出版社《国际研究丛书》第一种和《普萊格俄国史和世界共产主义丛刊》第一百零二种。本书主編利奧波德·拉貝茲现任美国《苏联东欧調查研究》杂志的副主編,是所謂苏联社会状况和馬克思主义意識形态研究“专家”。全书共收論文二十七篇,系由不同作者执笔。

本书的翻譯工作系由下列同志分別担任的:緒論和第五篇,柴金如譯;第一篇至第四篇,黃瑛譯;第六、七篇和第十五篇至第二十二篇,子月譯;第八篇和第二十六篇,刘永鑫譯;第九、十篇和第十二、十三篇,裘輝譯;第十一篇和第十四篇,叶寿曾、裘輝譯;第二十一篇和第二十七篇,蔡葆真譯;第二十二篇至第二十五篇,殷衣譯。

本书是供內部參考的。

商务印书館編輯部

1963 年 9 月

目 次

緒論.....	3
---------	---

第一部分 修正了的革命

一、先驅者: 爱德华·伯恩斯坦.....	29
二、馬克思和列宁之間: 格奧尔基·普列汉諾夫.....	43
三、自由与革命: 罗莎·卢森堡.....	59
四、不断革命論: 列夫·托洛茨基.....	73
五、列宁和斯大林之間: 尼古拉·布哈林.....	85
六、亚洲的革命: 罗易	102
七、从共产党宣言到八十一国共产党声明.....	114

第二部分 人格、真理和历史

八、哲学和社会: 亚历山大·波格丹諾夫	132
九、被遺忘的哲学家: 阿布拉姆·德波林	143
十、相对主义和阶级意識: 格奧尔格·卢卡奇	163
十一、希望的哲学家: 恩斯特·布洛赫	194
十二、卡尔·馬克思和古典的真理定义.....	211
十三、关于青年馬克思的研究: 一个回答	222
十四、关于异化的辯論.....	232

第三部分 新修正主义

十五、东欧修正主义的起源与意义.....	255
----------------------	-----

十六、东欧修正主义的衰亡·····	265
十七、东德修正主义：怪影与现实·····	286
十八、鉄托——一位勉强的修正主义者·····	310
十九、苏联经济学中的修正主义·····	324
二十、苏联专政的前途：奥托·鮑威尔·····	342

第四部分 新左翼

二十一、英国：新推理者·····	363
二十二、法国：新馬克思主义者·····	381
二十三、意大利：左翼的选择·····	395
二十四、德国：馬克思主义研究·····	410
二十五、美国：馬克思主义者在絕境中·····	428
二十六、日本：社会主义的分裂·····	443
二十七、印度：城市知識分子和农村問題·····	457
譯名对照表·····	472

緒 論

給修正主义下一个定义，应当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开始于爱德华·伯恩斯坦，他独立地试图重新检查馬克思某些原来的教义，修正主义这个名詞所指的，应当就是以后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实际上，問題要复杂得多，这个名詞的应用和滥用已經有一段很长的复杂历史。在我們自己这个时代，修正主义这个名詞不仅用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者或醒悟过来的年輕的共产党人，而且还用于共产党組織的領導人。鉄托元帅在中苏集团中已被正式称为“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个字眼被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人用到赫魯晓夫总理身上，而莫斯科則暗中把毛主席說成是“修正主义的教条主义者”。

我們似乎已經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即馬克思的精神继承人，不管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已經可以真正說出这样的話来：“我們现在都是修正主义者。”

在各种各样的正統派卫士当中，每个人都会坚决地否认这种說法，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见解当作唯一真实的解释，而那些背离这种解释的人才是修正主义者。显然，修正主义之于馬克思主义运动，一如异端之于宗教运动。成为經典的思想，迟早是需要修正的。当修正来自上面的时候，是一种教条代替另一种教条。于是这种修正就被称为“馬克思主义的創造性发展”。当修正来自独立的思想家的时候，它就被当作异端。异端是每一种正統学說的影子，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本书收入的論文就是抱着这种看法加以安排的。

馬克思的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主张改变的意識形态，而且是一种具有科学要求的理論（“科学的社会主义”），它預言未来的經濟、社会和政治发展，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它的預見終于要經受实际事态发展的考驗，而事态的发展是不同于馬克思主义者在理論的基础上普遍抱有的期待的。他們不得不丟弃的第一个东西是关于无产階級革命將在經濟发达国家发生的信念。恩格斯曾說过：“任何人如果說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沒有无产階級或者資产階級的国家中实现，那末这种話就証明他还必須学习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識。”这种說法，当初是不言而喻的。根据事后的观察，我們知道，《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历史看法是錯誤的：一百年以后，西方的“无产者”要失去的并不仅仅是他們身上的鎖鏈，同时照亮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的是毛的农民軍隊。所有这些同馬克思在《資本論》的一段著名的話里的預料很难調和起来：“生产資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最后便达到了它們同自己的資本主义外壳互不相容的地步。于是这个外壳破裂。資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剝夺者被剝夺了。”^①另外从那个把馬克思当作具有預見性的典范的国家里传出一陣悲慘的惊呼，那就是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約翰·高兰在英共第二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說的一段話：“难道英国作为产业革命的第一个国家，竟成为进行社会革命的最后一个国家嗎？”再沒有比当代共产党人的这种宣言距离馬克思自己的远见更遙远的了，而这些宣言正是来自代表“生产条件”光譜的另一极端的一些国家。

但是，即使实际的发展沒有証实馬克思的預言，理論与现实的矛盾也只能对馬克思主义的意識形态发生有限的損害。从邏輯上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4頁。——譯注

說，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關於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係的概念，可以（而後來也的確如此）用來說明修改理論是合理的。從心理學上說，對於革命的意識形態說來，對未來的美好願望要比任何數量的對社會現實的合理分析更為重要。然而，當伯恩斯坦開始有了一些懷疑（“農民沒有沉淪；中產階級沒有消失；危機沒有日益加劇；悲慘和農奴制沒有發展”）和在社會主義運動中發動了“大辯論”的時候，原來的理論還是適合於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思想的。馬克思主義者依然認真地把原來的理論當作理論，而不是僅僅當作一種祈禱詞；同時儘管這種理論早已走上逐步固定化的道路，但是它還沒有完全凝成一種正式的教條。這種情況只是到後來才成為事實，那就是當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一個國家內掌握了政權的時候，到這個時候在這個國家里，按照他們自己的前提，他們不能夠也不應當這樣做了。

馬克思毫無疑問是一個天才的社會分析家；但是，儘管他自己所喜愛的行動準則是“無所不疑”，可是他留給他的追隨者的遺產仍然是不明確的。他反對他們把他的教導當作聖經的傾向（“我所能肯定的是：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對理論的專斷態度、對不同意見的排斥，以及在證據面前還不願改變自己意見的心情，並不是我們現在所認為的科學態度的典範。正常的科學程序是，要承認理論也許有錯誤這樣一種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科學理論都具有一種假設的性質，它們都要根據材料的證明加以修正。因此，科學家原則上都是修正主義者。但是作為真正科學家的準繩的這種態度，不僅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目的論互不相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同革命的來世論也有矛盾，在這種來世論中，對於他的追隨者來說，寄希望於未來的因素要比任何理論上的論據具有更為強烈的吸引力。這是對馬克思理論公然採取修正主義態度

的真正障礙。一種寄希望于未來的意識形態要設法成為一種正統思想，或者在科學時代要披上科學的外衣，這都沒有什麼奇怪。如果說一種科學理論會“掌握群眾”並使之變成一種“物質力量”，那是不大可能的；群眾不會為科學的論據所感動。

然而，一種學說不管是作為一種理論或者是作為一種確立了的正統思想，即使只是由於政治效果方面的理由，也必須同現實保持接觸。理論上所需要的修改可以採取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它們的性質如何，公開的或者隱蔽的，這些修改都代表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學說遇到了它所未能預料的变化並設法調整本身，使自己適應這些變化。調整的過程既不是一帆風順的，也不是具有必然性的。這種調整過程可能“來自上面的”指導，但是受到正統思想固定化的妨礙；這種過程也可能“來自下面的”要求，可是那些迫切需要它的人又可能很容易超出學說的框子。那些準備承認高度工業化社會的非革命性質的人，事實上正在日益趨向於拋棄學說的理論前提。那些要保持其意識形態的革命主要出發點的人，則不得不顛倒原來的學說而在非工業社會中尋求新的牧場。

不管修正是同目的有關還是同手段有關，是关系到目的的合理性還是关系到權術，也不管修正的動機是出于人道主義還是出于專制，無論怎樣，修正的結果必然是不僅在原来的馬克思世界觀的理論假定方面發生重要的變化，而且也在其歷史的和哲學的看法上發生重要的變化。我們這個時代的革命性質是從工業的西方對經濟落後國家的影響當中產生的，而不是從經濟先進國家里生產力所遭到的資本主義束縛當中產生的。革命的態度同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力和生產條件之間的衝突並沒有任何明顯的因果關係。恰恰相反，革命的態度主要出現在生產力脆弱和資本主義關係不

发达的国家里。总之，革命的进程是馬克思所說的那些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資本主义条件不存在所造成的，而不是这些条件得到发展所造成的。这个同馬克思的前提相矛盾的事实，突出了随后发生的困境：在工业化資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者如果离开政治上的无能为力就不能繼續保持革命性；而在非工业化国家中，革命者則不能在十九世紀原来的意义上繼續保持社会主义者的称号。在这两种情况下，对于学說进行修正都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主义之分裂为“正統派”和“修正主义派”，只不过是有助于掩飾这样一个事实，即馬克思主义的前提对于二者已經都不适合。

因此，修正主义是在老正統派不再行得通的时候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严格地說来，所有的馬克思主义者从最初起就一直在修正学說的基本論点。在这个意义上，伯恩斯坦的論战是这个学說的馬克思阶段和馬克思主义阶段之間的分水岭，^① 而馬克思主义阶段对馬克思阶段來說是必然要成为修正主义的。但是“修正主义”这个名詞在这里的意义，当然不是一般使用的意义。这里的意义是这个名詞的更加具有局限性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已經为人們所普遍接受。这种修正主义的意思就是，试图摆脱馬克思学說的官方卫士而独立地“重新思考”馬克思学說。从历史的角度來說，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公开的修正主义过去有过两次大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共产主义修正主义。但是根据思想史来看，区别就一点也不那么清楚明白了。修正主义可能在正面败退而又从后門混进来，同时“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也对“修正主义”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貢獻。因此，直截了当的修正主义連同它所公开宣布的目标，同正統派在理論

^① 这个区分是魯倍耳先生提出的，它表明了馬克思自己的看法及其追隨者的看法。

上所作的合理化改变进行简单的对比，并不会为馬克思思想的修正和馬克思主义的演变这个复杂問題提供出一幅界限分明的图画。另外也不能把所有“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当作意識形态上的合理化改变。其中有一些虽然“把馬克思顛倒过来”，但是与經院式的詭辯还是有所不同，这些著作提供了观察我們这个时代問題的辨别能力。这一点当然只适用于那些准备独立思考的馬克思主义者，而不适用于“思想工作干部”。令人惊异的是，独立思考的馬克思主义者的許多想法最后怎么会納入了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而提出那些想法的作者，通常都被划为异端分子)。

要考証各种思想的起源，如果說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一項极为困难的任务。但是，要探索这些思想在历史上所隶属的派別，那倒是可能的。从这个角度看，“馬克思主义的創造性发展”的某些最重要的例子，实际上都是一种沿袭继承。思想史学家不可能不发现，列宁关于“先鋒”的概念和关于党的組織原則，早在《怎么办？》出现以前很久，奥加廖夫和特卡卓夫就已經以一种非常类似的形式表述过；而第一次提出在經濟不发达的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是赫尔芳德-帕尔烏斯，这个思想被托洛茨基大胆地接过来納入他的“不断革命論”，同时也被列宁大胆地但是經過一些(馬克思主义的)衡量而納入他的“不断革命論”；^①关于“帝国主

① 当托洛茨基要求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革命形势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当前目标时，列宁曾經尖銳地予以反駁：“这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革命专政只有在依靠大多数人民时才能支持一个时期。”当时列宁反对托洛茨基的想法并写道：“誰想不經過政治民主而由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謬的和反动的結論。”^②后来，列宁发展了他自己的“不断革命”方案。关于二者之间的分歧，官方的斯大林主义注释下了很大功夫，不过思想史学家(以及实际的政治家)都认为这些分歧被經院式地夸大了。这两种概念在理論上的分歧是，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阶段”以前需要有“一个工人和农

义”是“资本主义的更高阶段”这个概念，事实上在列宁以前就已经由霍布森、希法亭和罗莎·卢森堡提出；关于“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布哈林创立的，而由斯大林确定为正式的学说；在表述关于殖民地革命的思想方面，苏尔坦·加利耶夫^①和馬納本德拉·納斯·罗伊都是毛的先行者。毫无疑问，这些思想不管经过了什么样的修改才成为新正统思想的一部分，都应当归功于那些更早的思想家，而不是归功于那些通常被归功于的人。

这些差别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部分集中探讨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中修正问题特别尖锐的一个领域，即关于革命的理论。在修正了的革命中，对于若干竭力设法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重新作了探讨，对他们的思想同正统思想的关系以及同当代的关系都作了分析。这些人虽然都被称为异端分子，但是他们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在修正马克思主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过去总是常常遭到咒骂，

民专政的民主阶段”。这个微妙的区别在列宁发表1917年四月提纲以后，实际上同列宁已经没有什么关系。另一方面，巴尔沃斯的“衔接”革命思想（不管是以托洛茨基主义的形式还是以列宁主义的形式），如果同马克思在《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中所表明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仔细地比较一下，就会看出有若干重要的差别，虽然这些差别反映了马克思本人的革命急躁性。马克思在他的1848年的希望破灭以后，还是为他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迫性这一信念百般解释。只是到十年以后，他才为他的信念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时间表：“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②早年的马克思为革命的和哲学的修正主义者提供了引语的主要来源，晚年的恩格斯则既为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也为正统的党的哲学家提供了引语的主要来源。

②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页。——译注

① 参阅亚历山大·本宁森和香塔耳·奎耳克雅伊著《俄国伊斯兰教徒的民族运动》，拉阿耶-莫顿公司1960年出版。

而不是得到感謝，而現在在共產黨國家中已經正式被遺忘；儘管如此，他們的著述還是理應受到重視的，對這些著述的研究可能有助於了解革命理論在二十世紀的變化。

正像修正主義本身一樣，革命這個概念到現在為止也還遠遠不是那麼明確。在十九世紀，當馬克思使用這個字眼的時候，它是有明確的含義的：它使人聯想到築街壘的情景、人民反對當局的運動，這些行動最後都使已經建立的秩序發生變化。法國革命已經是公認的社會革命的模型，而 1917 年似乎肯定了這種概念。事實上，布爾什維克在這次革命中的所作所為只是它們要修改十九世紀的革命概念的第一步，而這個概念在當時以前及以後的某個時期依然還是他們的一個行動準繩。拋棄這個準繩有很多理由。有一個理由是明顯的，也是往往被提到的，那就是武器的发展；但是同樣重要的另一個理由是，“新型”的黨奪取政權的新技术的演變。因此，這個概念不僅拋棄了十九世紀的革命含義，而且在共產主義的詞匯里具有了一種新的意義。結果，革命便成了由黨奪取政權這樣一個概念。它已經不僅僅是一個舊式步槍和機關槍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德拉克羅瓦的象徵派畫法由於技術發展而變得過時的問題。它首先是列寧的組織原則所帶來的結果：革命不再必然是一種來自下面的推翻壓迫者的群眾運動，而變成了一種有組織的行動，在這種行動中，社會行動的自發性已經不再被當作社會變革的必要條件。列寧本人對於自發性是抱着懷疑態度的，不過他還是同意革命是一種本質上的激變這樣一種老的看法，這種革命應當靈活運用，而不能從上面強加給別人。他同意十九世紀的革命觀為革命提供了基礎；他還把革命設想為粉碎舊秩序及其國家機器，而代之以通過革命解放出來的純潔的新力量的過程。因此，例如，列寧對於參加“資產階級政府”（“米勒蘭主義”）的思想深惡

痛絕，认为这种做法是背叛革命，这是当时的革命者当中十分普遍的一种情緒。这些革命者并不是把革命仅仅当作一种社会现象，当作社会变革的許多方式之一，而是当作一种希望的象征，当作通往幸福的未来的大門；同旧秩序的力量妥协是絕對不能容許的，也不能同代表邪恶的东西打交道。

革命以后，由于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取得了經驗，这种态度有了一些改变。来世論还是保留下来，但是在取得政权的方法上容許有大得多的策略灵活性。革命这个名詞到这个时候便用来表示一套多种多样的实践。象征代替了现实。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通过組織游击战而取得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人也是这样。二者在他們的国家里都談論革命。羅馬尼亚共产党人在他們的国家里也談論革命，这种情况据說战后才出现。当时的情况是，苏軍占領这个国家以后，維辛斯基便关闭了王宮的大門，强迫国王把政权移交給羅馬尼亚共产党的九百名党员。当时在东欧其他国家里也并没有革命运动；組織新秩序的領袖們，正像鉄托所說的，都是嘴里衔着烟斗、乘坐苏联飞机从外国运去的。凡是发生了政治和社会的根本变革的地方，都是苏軍强加的政权，沒有經過革命就带来了革命的結果。斯大林主义的“来自上面的革命”被輸出了，并且从外面强加于人。1948年2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另外一种夺取政权的情况；在这个国家，党是通过来自下面和上面的联合压力而达到目的。^① 参加資产階級政府——即列宁所憎恶的“米勒兰主义”

① 揚·柯薩克在《職工怎样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扮演革命角色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一书中曾經率直地描述这种方法，并为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得出了普遍性的教訓。該书的英譯本于1961年在伦敦出版，兰貝思的摩里遜勋爵为該书写了序言。柯薩克的結論是：“捷克的經驗表明，过渡的特殊形式并不影响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結果。”

——到这个时候便成为一种已经接受的从内部进行颠覆(“从上面施加压力”)的方法。这种做法得到成功的机会,当然决定于外部的力量对比,但是毋庸置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共产党革命理论的演变,以及关于所谓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宣布,都同在新的力量均势下需要更大的策略灵活性有关。

不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扩大共产党影响的主要场所。这种情况必然牵涉到越来越从根本上修正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旧的先决条件,即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早就被抛弃了。在不发达国家,严格地说来,这种先决条件根本不存在。但是这些国家里的革命态度还是可以用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因此,对理论的修正主要是关于策略方面的问题:同“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民族主义运动和新独立国家的政府的关系。但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越来越隐晦,新理论越来越不明确。^①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积极的政治家把他们的大部分精神集中在思考革命理论上,企图把原来马克思的行动纲领同实际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他们或者像伯恩斯坦那样抛弃了马克思的行动纲领,或者在考虑到不发达国家的实际社会条件的情况下重新思考马克思的行动纲领,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经济先进地区的改良主义者和落后地区的革命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变革的过程。特别是西方的社会学家,由于他们忽略革命问题,如果能不仅更多地注意这个问题本身(它同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传统相距很远),而且更多地注意研究这些被遗忘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那就可能有所

^① 关于“人民民主”概念的讨论,见戈登·斯基林作《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革命》一文,载《苏联研究》,1961年1—4月号。关于“民族民主”——即不发达国家的一个过渡阶段——的新概念,还很少有公开的讨论。

收获。这些馬克思主义思想家,尽管在他們的学說上帶有盲目性,但往往处理一些真正的問題,而且有时对于这些問題具有卓越的理解。革命同意外事件一样,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由一定的原因促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革命之所以到来,或者是由于忽略了改良措施,或者是由于改良措施实行得过迟。可以不用怀疑,革命知識分子的“临界人物”(“marginal men”),即“武装了的知識分子”,通常对于革命形势的了解要比西方分析家深入得多。

但是,就是把自己的知識貢獻給革命的这些革命知識分子,到头来都为他們思想的独立性而付出了代价。迟早他們被斥为异端分子而遭到了貶黜。他們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不再成为知識分子,要么結果是被解除武装。托洛茨基这个“非武装的預言家”,只不过是許多例子中的一个。哲学家的任务是不仅要說明世界而且还要改变世界,这个思想說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帝王很少是优秀的哲学家,而哲学家也很少是成功的党的書記。《費尔巴哈論綱》中作为“类属”(junctim)的那种东西,在分工的现代世界中便成为維尔納·桑巴特所說的“二灵論”(Die Zwei-Seelen-Theorie),也就是在个人方面革命热情和各种各样的要求之間的冲突。关心革命理論的政治家被那些各种各样的要求所压倒的程度,并不比那些致力于分析馬克思理論的更根本的方面和不大积极活动的哲学家少。

在这些問題当中,坚持真理和远离正道的問題、自由和社会变革的問題以及人格和历史的問題,都是最突出的。这些問題在这样一些馬克思主义者当中引起了最大的怀疑,他們沉醉于独立思考,因而在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进行的哲学討論中表现了最大的修正主义热情。

本书的第二部分人格、真理和历史,就是探討这些問題以及在